

此时此地的现实： 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与香港作家宋芝

吴小保*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左翼马华文学界在 1947、48 年爆发一场持续半年的大论战，论战围绕在“马华文艺独特性”和“侨民文艺”两个主题开展，论者一般认为，这是马来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就中国革命和马来亚革命殊先殊次的问题，产生意见分歧所致。论战两大主将与阵地是吉隆坡《战友报》和《民声报》的周容（另署金枝芒、乳婴等）和星加坡《南侨日报》和《风下》杂志的沙平（胡愈之）。历来学界对独特性论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身在新马两地的文人。本文认为，周容在论战期间所提出的若干概念，包括“此时此地”，早在论战爆发前期就已经出现在新马港等地，并且进行了充分地理论化工作。其中，“此时此地”的讨论，不仅得到新马两地文人的讨论，香港南来文人宋芝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其中。宋芝，另署司马文森，二战后活跃于香港左翼文坛，就目前资料所见，他应没有直接参与独特性论战。但在论战爆发的前期，他曾多次越洋在南洋发表文章，并且透过《文艺生活》杂志积极与当年的马华文坛建立联系。1947 年，《民声报》发表宋芝的“文艺学习散记”系列文章，也许受到新马文坛彼时新兴思潮影响，宋芝在文章中处理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引起零散的后续讨论。本文将追溯在独特性论战前期，香港文人宋芝如何讨论“此时此地的现实”。

关键词：独特性论战前期，此时此地，左翼文学，香港，宋芝

* 吴小保，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gohsiewpoh@yahoo.com.sg。

The Reality of the Here and Now: The Mahua Literary Uniqueness Debate and Hong Kong Writer Song Zhi

GOH Siew Poh
Center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Abstract

In 1947 and 1948, a major literary debate broke out within the left-wing Mahua literary circle, lasting for about half a year. The debate centred around two main themes: the “uniqueness of Mahua literature” and “diaspora literature”. 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disagreement stemmed from differing views between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on which revolution – the Malayan or the Chinese – was more important and which should take place first. The two main figures in the debate were Zhou Rong, associated with *Zhanyou Bao* and *Minsheng Bao* in Kuala Lumpur, and Sha Ping, affiliated with *NanQiao Ribao* and *Fengxia magazine* in Singapore. Previous academic discussions of this “uniqueness debate”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writers based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Howev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everal concepts raised by Zhou Rong during the debate – such as “here and now” – had already emerged and been theorized earlier in places like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laya. The concept of “here and now” was not only discussed by writer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but also engaged with, to some extent, by Hong Kong’s left-wing literary figure Song Zhi. While availabl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Song Zhi did not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the uniqueness debate, he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Hong Kong’s leftist literary scene after World War II.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debate, he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in Nanyang and actively engaged with Mahua literature through the Hong Kong-based magazine *Wenyi Shenghuo*. In 1947, *Minsheng Bao* published Song Zhi’s “Notes on Learning Literature” series, which ma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emerging literary currents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In these writings, he addressed the idea of “here and now”, sparking some scattered follow-up discussions. This article traces how Song Zhi, as a Hong Kong writer, engaged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reality of the here and now”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uniqueness debate.

Keywords: early phase of the uniqueness debate, here and now, leftist literature, Hong Kong, Song Zhi

一、前言

马华文艺独特性是左翼马华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诞生于一场于 1947 年杪、48 年初之间爆发的大论战。彼时新马正踏上反殖民运动的列车，走上争取独立建国的大道。论战双方主要以星加坡《南侨日报》和《风下》杂志的侨民派，以及吉隆坡《战友报》和《民声报》的马华派为主，战火更延烧到其他报刊杂志，如《星洲日报》、《现代周刊》，甚至包括远在香港的《文艺生活》。一般认为，独特性论战主要肇因是马来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之间，关于应以马来亚革命优先还是以中国革命优先的革命斗争路线，双方产生意见分歧所致（唐林，2000；谢诗坚，2009；Chong，2016）。这一说法固然没错，但却可能会误以为独特性论战参与者是以“非此即彼”的二元思路来处理问题。晚近的一些的新研究指出，当时大部分人都不是以去中国化的方式来处理中国文艺、侨民文艺与马华文艺独特性（苏颖欣，2021），而是尝试在世界、中国和马来亚多重性中把多种矛盾统一起来，从而解决“马华民族”理念在诞生之初，所面临的普遍性和独特性的矛盾问题（吴小保，2020；吴小保，2023）。

随着“马华民族”概念的酝酿，“华侨意识”渐渐褪去，而这过程的演变跟“此时此地”或“此时此地的现实”概念的形成与巩固脱离不了关系。一般人在谈起“此时此地的现实”，都会想起周容在论战期间发表的论述文章。事实上，“此时此地”一说，作为一个左翼文学的概念，在独特性论战的前期就已经出现，并得到相当充分的讨论¹。而参与讨论的不仅有马华作家，还有战后香港的南来文人宋芝。宋芝，又署司马文森，活跃于香港左翼文坛，在独特性论战前期多次越洋在南洋发表文章，并透过其与同道创办的文艺生活社与《文艺生活》杂志，积极与马华文坛（包括南洋其他地区）建立联系。在这期间，正逢马来亚反殖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各种新兴思潮涌起，“马华民族”理念的雏形正在酝酿之中。受到马华文坛文友的影响，宋芝也加入了独特性论战前期在马华文坛的新思潮运动。1947 年 7 月，宋芝在《民声报》发表“文艺学习散记”系列专稿，设了 9 个题目、合共 25 篇文章，其中三篇文特别讨论了“此时此地”的课题。除此之外，宋芝也发表了一些讨论如何建立马华民主文艺阵线的文章，这都是他讨论“此时此地”的重要文章。本文将以前期在独特性论战前期在马华文坛的跨海参与为个案，整理一段可能为人忽略的“此时此地”观念的形成史。

¹ 此处前期大概是指 1946 年至 1947 年杪论战爆发之前，主要参考原不二夫对马来亚共产党的马来亚认同和中国认同的处理办法，他认为马共早期还有中国认同，也坚持双重国籍（原不二夫，2006）。但是，在 1947 年 11 月 21 日《战友报》刊登马来亚民主同盟总书记余柱业的访谈，这是马共属下出版物第一次公开明确否定双重国籍。另，左派跨族群联盟于 1947 年 8 月 10 日制定的《人民宪法》也否定双重国籍。故，马共的“马来亚化”时期，大略是在这个时候，至翌年四月过后走向激进化，全面否定此前的和平路线，包括否定《人民宪章》、批判陈祯禄，转向武装斗争。而在这之前则是坚持双重国籍，并且有更强的中国认同。本文“独特性论战前期”大略指余柱业那篇访谈之前，此时马共及其文人集团处于一种“双重国籍”、“中国认同”、“马来亚认同”同时存在的过渡期，但内部可能已经大致有个谱，要走向“马华民族”的未来。

二、独特性论战的三个面向

本文把独特性论战中重要概念（此时此地、独特性、马华民族等）的形成区分三个面向来讨论，分别是（一）外部的时政局势，（二）内部的左翼文艺理论，（三）文人社群的建立。前两者是“此时此地”概念之形成的外部局势推动力，以及内部理论资源根据，第三点则是此概念形成的行动者所构成的活动网络。

1947 年，华巫印三大民族的左倾势力开始联合起来，成立人民力量中心—全马人民联合行动理事会（Putera-AMCJA），以反对英殖民计划实行的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宪政，参与草拟的其中一个背后势力包括了马来亚共产党，而该党喉舌《民声报》更是大力推广《人民宪章》。除了在各地举办群众抗议大会、总罢工等，该联盟也推出《人民宪章》（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作为取代马来亚联合邦宪政的替代方案。该宪草的一个重要条规是，公民权就是国籍，而其名称是“马来由”（Melayu）²。此公民权之取得门槛相比殖民政府拟定的更为宽松，除了规定居住年份，其他条件包括必须效忠于本邦斯土，不得有二心（PUTERA-AMCJA, 2017, p. 59）³。此一《人民宪章》运动在 1947 年下半年进入高潮，翌年随着马来亚联合邦宪政的落实以及英殖民打压反对力量，这场运动遇到重挫。独特性论战就是在这样的时政局势变化期间爆发。也因此，尽管在 1947 年的大部分时间，左派文人仍自称中国人、视中国为祖国，同时也呼吁大家要关心中国和马来亚的革命，而殊重殊轻则视个别人的意愿。但是，参照左派党团所同意的《人民宪章》的“必须效忠于本邦斯土”之规定。他们在 1947 年期间，也就是独特性论战前期的隐议程，应该是在计划着酝酿“马华民族”的诞生。然而，也许因为当时大部分群众的身份认同仍未跟上脚步，故左翼精英在公开场合仍以中国人自居。⁴这情况后来出现微妙的变化，随着政治斗争进一步加剧，在独特性论战期间人们开始探讨“马华民族”的可能性，并且得到侨民派和马华派双方的认可，诸如光明（1948）、文萱（1948）、秋枫（1948）

² 在战后马来亚的政治论述中，其中一种想法是公民权不等同于国籍，其背后思路是要捍卫“马来亚是马来人的马来亚”的主张。持此论调之佼佼者是拿督翁（Dato Ong Jaafar）领导的巫统。许德发在讨论独立前宪政斗争时，把此思路逻辑称为“马来原地主义”（许德发，2022）。《民声报》对马来原地主义有诸多批判，独特性论战的大将周容为此写了不少杂文，参周容（1947b）、周容（1947d）等。依此脉络，《人民宪章》把公民权等同于国籍，尽管把它命名为“马来由”，在当时却是个大胆破格的主张；但这不表示在其他方面，左翼马来与马华双方就毫无分歧，特别是马来特权，但这非本文重点，从略。

³ 《人民宪章》更是提到一种假设情景，如果马来亚与中国发生战争，“如果被要求这么做，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为保卫马来亚而对抗中国？”（Are you prepared, if called upon to do so, to fight in the defence of Malaya against China?）（PUTERA-AMCJA, 2017, p. 78）。

⁴ 这情形可能可以推得更早，例如《民声报》社论在 1946 年提到：“华侨在马来亚得到公民权也不见得不能同时兼有中国籍，即令不能，也不见得就是什么损失。英国人移植到美洲和澳洲即成为美国人和澳洲人，不单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是一种光荣，因为他们都因此建立起很强大的国家。”（社论，1946）此时左翼精英可能已经在酝酿“马华民族”的隐议程了，或至少说，他们不排斥“马华民族”的出现。因此，才会用此类说法来为民众做心理建设。

等都提过类似观点。但是，要取得一般民众的支持，并接受成为马来亚人，却需要更多时间，直至 1950 年代方才告转向成功（崔贵强，2007）。

且以罗骚在 1946 年底在《民声报》发表的一篇长文为例子，说明上述的转变过程。在该文中作者提到，华侨不关心马来亚政制的原因之一在于“把‘中国国民’与马来亚‘公民’对立起来看”（罗骚，1946a）。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对罗骚而言，中国国民和马来亚公民是不相悖的，故两者可兼得⁵。这其中的逻辑究竟跟拿督翁等人“公民权不等同国籍”有何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无论如何，随着当地政局不断演进，以及“此时此地”概念的不断充实，“公民必须等同于国民”，一如《人民宪章》所规定的那样，已成为左派文人的公开议程，并在日后渐渐为部分的人所接受。这表示人们的观念在 1947、48 年之间缓慢地出现变化。独特性论战、此时此地、马华民族正是在如此政局变化下形成。

换言之，《人民宪章》对独特性论战之“马华民族”理念的塑造，起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作用（反过来说也成立），而这其实跟“此时此地的现实”概念的形成是同时进行，并相辅相成。必须指出，左翼文人虽然大力推崇《人民宪章》，乃至发动研究宪草的群众运动（社论，1947a），但他们并非对宪草所有主张照单全收，这是因为当时的运动采取跨族群联盟形式，必须与其他势力协商拟定共同目标与行动方针，这在一定程度限制了他们对宪草的决定权。《民声报》在 1947 年开始不断为华巫印三族联合行动敲锣打鼓（社论，1947d；社论，1947f；社论，1947g），这些呼吁也出现在文学创作中，如贾芝裳的〈不能征服的人〉（贾芝裳，1947）。之所以要为联合行动提供合理性，或为之作出呼吁，不仅是因为当时各族群彼此互不相识，更重要是因为“各民族各阶层的相互间对次要的问题彼此间作些让步或容忍有时是必要的”（社论，1947g）、“各民族对其自身的个别要求，不要过分的强调，影响共同利益的争取与共同要求的实现”（社论，1947d）。以上这些刊登在社论的言论，充分地表明当时左派尝试在说服群众接受《人民宪章》，并作出一定的让步。而这让步就体现在马华左翼在《人民宪章》特定条款的妥协上，

⁵ 罗骚何许人？可能是个模仿欧洲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卢骚（Jean-Jacques Rousseau）的笔名。他应该不是一般读者。这篇长文分上中下三期刊登，一般人不会有这种待遇。关于国籍和公民权，罗骚有进一步讨论，兹引如下：“（四）把中国‘国民’与马来亚的‘公民’看成对立关系的东西——这里所指的‘公民’，乃是真正赋有任何‘公民权’的公民，并非只有‘公民资格’而没有公民权利的‘亡国奴’公民。同时，公民资格的规定亦应是合理化的。华族之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本身原属中华‘国民’，再入籍承认为马来亚的‘公民’，就好像是‘一子承二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把中华‘国民’与马来亚‘公民’看做对立的关系。但本年四月廿一日英殖民部宣布华侨享有‘两重’国籍，实际就是粉碎了这种见识（○为字迹不清）。华侨在马来亚，是中华‘国民’的同时应又是马来亚的合法的公民。这就是说：华族因身居马来亚，事业权益寄托在马来亚，华族在马来亚政治关系，负有政治关系上的义务，同时，亦享有政治关系上的权利。只须具备合理化规定的公民资格，并不须退出中国国籍，便实际上就成为马来亚合法的公民。不然，哪里还有所谓‘两重’国籍？”（罗骚，1946b）此处罗骚是顺着殖民地政策去处理中国国民和马来亚公民的矛盾，但在 1947 年随着《人民宪章》的出炉，彼时左翼精英的想法已大不相同。

包括公民权与国籍被称作“马来由”，以及首三届立法议员马来裔必须占 55% 之规定、照顾特定的马来人特权等⁶。如果说以巫统为首的马来民族主义提出的“马来人的马来亚”是马来原地主义的一个版本，则左翼马来尽管相对宽容，却仍然持类似的论调，即认为马来人是此地的主人，非马来人是客人。尽管面目略为不同，但仍然是马来原地主义。

对于新宪草之不满，《民声报》社论寄望来日加以修正，所需修正的包括“新宪草的拟定对于马来民族利益显然是比较偏重的”，并认为“我们觉得如果新宪草能以各族人民都有一种感觉，认为这并不是马来民族让其他马来亚民族来参加建国工作，而是马来亚各民族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共同为实现马来亚民主自治而努力，那我们相信马来亚的民主自治运动的推进将更迅速，将更顺利，而‘分而治之’的伎俩也必将无从施展了。”（社论，1947h）

必须指出，1947 年的左翼马华并没有完全告别“中国人”身份，他们仍以“中国人”自称、以“中国”为祖国。这可能是当时人们仍处于过渡期，一时改不了口；也有另一个可能：左翼精英已经笃定要催生“马华民族”，却因为一般大众未必能接受，只好按部就班地慢慢推动此议程。

同个道理，左翼也没有不再关注“中国”。尽管在独特性论战前期，已有许多文章呼吁大家要关心“此时此地的现实”，但是，《民声报》的文人集团仍然持续密切关心中国局势的发展。例如，在 1947 年马来亚民主运动的“决定性关头”前两三个月⁷，中国学生发动一场“六二”运动，《民声报》发表社论呼吁马来亚青年学生齐起响应：

马来亚的青年学生的切身重大任务，固有更大的更重要于祖国和平民主运动者，但就和平不可分割一语而言，民主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反法西斯残余当然更是不可分割。今天，马来亚青年学生正在当地争取着民主自由和自治地位，这任务对于马来亚青年学生是居于首要的，但祖国之成为民主的中国或法西斯的中国，对于马来亚的争民主自治运动亦不无相当影响。……万一该法西斯政权不幸而获暂时稳定，其对海外民主自治运动及民主人士的破坏和恫吓，将十百倍于今日固无待言了。（社论，1947b）⁸

⁶ 根据有份参与草拟宪草的穆斯达法胡申的回忆录，上述这些保障马来人权益的条款都是他积极争取的，（Hussain, 1999），而其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担心马来人会失去自己的马来邦。换言之，他所表现的是许德发所谈的马来原地主义的忧患意识。

⁷ “马来亚政治制度新建议书发表后，关系着各民族各阶层利益的战后马来亚政治问题，已经到了决定性关头……”（社论，1947c）虽则这“决定性关头”是指 9 月，但与 6 月不过相隔 3 个月。

⁸ 其他相似的观点，如：“全马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侨胞，尤其是无数的进步青年学生们，应毫无疑问地，一致起来响应这一伟大运动……尤其是，我们正在争持马来亚的民主时，更要争持祖国的和平与民主，因为全世界的民主是分不开的，且中国又是东亚，甚至全世界民主的晴雨表呀！”（仇特，1947）

此时一个有别于“中国民族”的“马华民族”概念仍未公开出现或仍未普及（故仍自视中国人），但却开始把当地的革命任务优先于中国，而人们之所以呼吁大家要关心中国，乃是从普世价值（和平、民主）与切身关怀（对马来亚革命运动的影响）出发⁹。而这正是“此时此地的现实”理论的完整写照：“此时”与“此地”不受制于狭隘的特殊主义，反之是受到普世理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左派理论）所引导¹⁰，从而必须兼顾普世与特殊。换言之，“此时此地”（独特性）总是牵绊着“彼时彼地”（普世性），而后者的“时”乃作为时间政治的意识形态，用左翼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决定论所预设的历史总体趋向，即必须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而其“地”则表现为“国际-马华-中国”的三元空间政治结构。这个“时空”政治意识形态是作为理解何谓“真实”与“现实”的理论根据。

事实上，此一理论同时也深深地根植于左翼马华所深信不疑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而这是理解独特性论战的第二个面向，即内在的理论资源。概略来说，革命现实主义由文艺、生活、战斗三位一体所构成。文艺源自生活，盲目的生活是不可取的，因此必须要有理论指导；此理论无他，必定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开创的革命理论。既然生活必须要为理念战斗，那么源自生活的文艺就顺理成章成为战斗的工具。根据这一套“文艺-生活-战斗”三位一体论，离散到马来亚的南来文人，随着在当地“生活”的不断深入，并认清“战斗”的正确方向之后，“文艺”自然就必须书写“此时此地的现实”，因为那是你的“生活”所在，故亦是“战斗”之奋斗目标所在。且看以下两则引言，当可确证，上述的分析有据可依：

要等文艺作者写的东西很多，此时此地的现实战斗，有着丰富的内容，动人的场面，此时此地的现实战斗提供了数不尽的新人新事。问题是，文艺创作和生活实践的统一。没有生活经验不能写出文艺作品……（周云，1947）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唯一的泉源是作为自然形态的人民生活。……一切文艺，除非洋奴文艺，庙堂文艺，帮闲文艺，如若是服务于人民斗争的具有战斗性的文艺，必然和“此时此地”的政治斗争，从配合发展到结合……（周容，1947a）

⁹ 当时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视南洋华侨和平民主运动为中国和平运动的支流，后者的解放将有助华侨的翻身，如胡愈之（1947），另一观点则反过来，民主的马来亚将减少华侨在当地受到政治打压，从而更有力量声援中国的斗争，如少康（1947）。两篇文章的发表相隔不过两周，也许少康是有意针对胡愈之的观点提出挑战。

¹⁰ 马华左派战后的“民族观”不可从特殊角度去理解，如同《民声报》社论所言：“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的问题，必然和新民主运动合成一体的。民族独立自治的要求和运动的发展，必然是新民主运动的发展，如此，才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和真正的自治。”（社论，1945）所谓“新民主”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战后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故一切运动，包括马来亚文艺运动“决不能从新民主主义这一洪流中分离出来”（老蕾，1945）。

根据以上讨论,“此时此地的现实”不仅是偶然的外部政治环境所促成。例如,殖民地宪政运动、马来原地主义、《人民宪章》等对塑造马华民族概念的影响。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此时此地的现实”其实也可在左翼革命文艺理论中找到根据或受其启发,故有一定的理论必然性。说它是必然,因为即便不是周容或其伙伴,“此时此地的现实”必定会因着相关理论的逻辑推演,以及作家群体的迁移,而被其他人发现。而“此时此地的现实”原理本来并不规定一个人必须“效忠于本邦斯土”(因此很多华侨派也不完全反对此概念)。但是,在面对各种外在环境制约下,特别是马来原地主义(无论是左派或右派),最终慢慢地发展成必须对“公民权”、“国籍”等有关的身份认同概念作一更明确的处理。“马华民族”正是在各种政治势力冲击之下形成,“此时此地的现实”概念也无法自绝于外。

“此时此地”概念不仅受政局影响,以及得益于左翼文艺理论的启发,同时也跟一个跨海跨域的文人社群网络的建设有关,而宋芝就是介入此概念塑造过程中的其中一位积极分子。

三、“此时此地”溯源:宋芝的角色

“此时此地”四字,本来可能只是一个稀疏平常的中文字组合,它原初的意思不过是指“这个时候,这个地点”,强调的是“当下的一刻”。然而,这个概念在马华左翼文坛却有另一番意思。根据本文的初步搜查¹¹，“此时此地”至迟在1946年11月23日已经出现,《民声报》读者郎人针对该报副刊《新风》创办一个月提反馈意见:“我对《新风》的意见,有下列二点,就是:一,须多登些现实的材料,因为《新风》是出生在马来亚,如不能,或太少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就会可能流于庸俗。”(编者,1946)不久后,木公发表的文章提到:“战前有人喊出了,马来亚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问题。那时的理由可以说,马来亚还没有来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写作者没有经过此时此地的大时代的锻炼,哪里可能产生什么伟大作品呢?”(木公,1946)郎人和木公的意见相当重要,因为他们把书写“此时此地”与作品是庸俗还是伟大挂钩起来讨论。这说明,“此时此地”已成为一个分析文学的概念,而有别于其本来字面含有的一般意思的“这个时候,这个地点”。

¹¹ “溯源”可以是个无止尽也可能是白费的工作,因为资料浩瀚,谁能遍览所有资料?另外,本文的“溯源”主要集中在《民声报》,未涉猎其他报刊,故也并不完整(有待日后补充)。但此处的考察重点不在于“此时此地”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而是要指出,它在什么时候开始被人们重视?

“此时此地”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仍停留在相当粗糙的设想（没有书写此时此地就是庸俗，反之则可能出现伟大作品）¹²。但是，编者（应该是西玲）却积极地向各界邀稿讨论此课题，例如1947年5月，中国作家周刚鸣来信，提到《新风》编辑发信给他，请他针对“马华文协”和“不写当地生活的倾向”两个问题发表意见：“一个报纸副刊，不能反映当前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生活里有关的问题，那么它就失掉了反映现实，指导现实的作用。”（周刚鸣，1947）周刚鸣虽未用“此时此地”四字，却提了近似的“当前当地”，且把其中左翼文学的“文艺-生活-战斗”三位一体论简要地表达了出来。

1947年7月22日，《民声报·新风》的“稿约”明确把“此时此地的现实”列为征稿要求：

二、杂文短论，所谈问题尽量从小题目着眼，内容以能针对此时此地的现实，万勿拖泥带水，空发远距离的大议论。（编者，1947c）

“此时此地的现实”概念被列为投稿条件，大幅度提高其重要性。也在差不多这个时候，1947年7月19日，宋芝开始在《民声报》发表“文艺学习散记”系列专稿，所讨论的九大主题中就包括“表现此时此地问题”¹³。一位率先读到这批空邮过来的稿件的读者（据他自称是第一位原稿读者，应是《民声报》内部人士），在介绍这系列专稿时把重点放在“此时此地”，比如他提到宋芝鼓励大家“发掘我们此时此地某些基本写作态度及其处理方法”、并盛赞他的文章是“对这样坚实而于此时此地的文艺青年朋友有裨益的东西”（阿宁，1947）。值得注意的是，阿宁提到一个重要的点，解释了为何一位香港南来作家会去讨论新马的“此时此地”的原因。原来宋芝有份参与的文艺生活社在当时向海外征求社员，据悉其社员总数之 half 以上来自海外。因此之故，宋芝在通读南洋的副刊作品后，开始关心当地文坛的新动向（阿宁，1947）。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宋芝才开始计划撰写一系列针对海外写作诸问题的专稿。¹⁴

¹² 注意，此处仅指人们没有以“此时此地”作为论述概念进行讨论，并不表示对此课题没有进一步思考。例如，海生整理马六甲写作人集体座谈会，提出了类似后来在独特性论战期间，海郎提出的空间等级秩序，即先马来亚，次中国，后世界（海郎，1948）。海生则认为《新风》比例必须以反映马来亚五分，中国三分，翻译二分（海生，1946）。这个等级次序其实跟“此时此地”颇有关联，即必须以本地为优先。

¹³ 宋芝的〈表现“此时此地”问题〉分三期连载于1947年8月23、25和29日的《民声报》。该文引起一位读者文卒的响应，其中挑起的问题包括马华文学的贫困是谁的责任、语言地方性等问题（宋芝，1947b；宋芝，1947c；宋芝，1947d）。宋芝于9月30日和10月1日发表〈再谈“表现此时此地”问题：并答文卒先生〉回应文卒，所以他在《民声报》以“此时此地”为题发表的文章合共两篇。我认为，也必须把司马文森发表于1947年4月3日、4日和5日的〈建立马华文艺战线〉（司马文森，1947b；司马文森，1947c；司马文森，1947d）和宋芝发表于5月30日的〈建立马来亚“文艺阵线”问题〉包括进来讨论。

¹⁴ 根据宋芝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写“学习散记”，跟《民声报》编辑的提议有关（宋芝，1947e）。此编辑应该就是常跟他联系的西玲。

1947 年中旬之后,“此时此地”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甚至远在香港的《文艺生活》也参与其中。玉女在《民声报》介绍《文艺生活》新第十六期内容时,提到该期杂志的一篇文章〈海外有什么题材〉,并表示该文鼓励海外文艺作者应注意“此时此地”文艺宝藏的发掘是很有意义的(玉女,1947)。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后,引来周云的回应,该文作者对于本地文人吹捧外人的论述感到不是滋味,说道:“文艺创作,不能脱离现实,不能不表现此时此地,已经是常识了”、“连国内关心海外文艺的人,也要大叫‘此时此地’了!好像海外文艺幼稚到连有些‘什么题材’都不知道了”(周云,1947)。周云接下来的一番论调,颇似周容在独特性论战期间的论点:

文艺创作,是不能够像一些报纸编辑方针一样,不站在此时此地的现实的立场,文艺创作有着生活实践和经验的种种限制,写此时此地以外的战斗,任务,故事,是没有可能的。一些报纸副刊所以没有一点战斗的生气,就说明了这一点,私人的诉怨和湘北的流亡,无论怎样说得好像国家民族的苦难尽萃于一身都好,无论怎样有人吹嘘推荐都好,是不大会有此时此地的战斗作用的。(周云,1947)

文中提到文艺创作不能够像编辑报纸以及“湘北的流亡”,颇似周容在论战期间提到文学创作不能“手执报纸眼望天外”与“逃难作家”之说法(周容,1947a),这让人不禁怀疑二人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此时此地”的道德正当性已经建立起来,其中的“文艺-生活-战斗”三位一体的革命现实主义原理也已被各路理论家梳理通透,剩下的就是等待独特性论战的爆发,然后把这些早已备妥的论述弹药派上用场。

综上所述,宋芝在参与“此时此地”论述的建构时扮演了两大角色。其一,他系统性地讨论“此时此地”,使之更为理论化。其次,他扮演中介角色,让“此时此地”成为广大海外华侨作家共同关心的课题。例如,其掌管的《文艺生活》就发表一些相关文论(如那篇〈海外有什么题材〉),甚至组织了一些人(如郭沫若)参与独特性论战¹⁵。

¹⁵ 我目前未有机会系统性翻阅《文艺生活》,无法确知该刊如何讨论“此时此地”,仅能透过《民声报》的转述略知一二;对宋芝的文学活动也局限于《民声报》,这些不足日后有机会再补。另,1948年3月16日,郭沫若发表〈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提到当初他会介入独特性论战,是司马文森向他邀稿(郭沫若,1948)。该文同时刊登在檳城《现代日报》、吉隆坡《民声报》和新加坡《南侨日报》,为论争定调的意味明显。

四、跨海跨域的文人社群

与“此时此地”之形成有关的文人社群，可粗略分成两条线索。一条是战后马华左派文人集思广益讨论文艺界的组织化问题，结果是酝酿要成立——最终并未成事——“马华文协”。在这过程中的议论，引发了“马华文协”究竟是中国文协海外支部还是独立组织的话题，“马华文艺独特性”议题就蕴含在此次论争中，而这又跟“此时此地的现实”概念紧密相连。讨论组织化的一个成果是催促“吉隆坡文艺研究会”的成立，而此研究会后来成为打造“此时此地”文艺新体制的其中一个重要文艺组织。另一条线索是战后香港左翼文坛，以宋芝为主导，尝试与马华文坛取得联系，打造民主旗帜下的进步文艺体制，而形成的跨海跨域的文人社群，如前所述，在宋芝穿针引线下香港文坛也开始出现“此时此地”的讨论。本节着重处理后一条线索。

宋芝，或司马文森，在《民声报》的第一次登场是1947年2月，此时马来亚的宪制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2月15日，编辑预告将刊登司马文森中篇小说〈鲜花开在枯岭上〉，并提到作者承诺将常为该刊供稿（编者，1947a）。果然如来信所言，日后司马文森常越洋投稿，成为南洋读者所熟知的作家。该中篇小说于是年2月17日开始连载至3月22日，全文约3万余字。

在小说连载之际，司马文森与陈残云联名向《民声报》投书，寻求海外读者支助《文艺生活》，并为该社征求社员：

一年来刻苦支撑，尚能勉强应付，近已处境日非，内地检扣禁售地区日多，使我们在营业上蒙受影响，亏蚀甚大，长此下去实难支持。为维持此一民主文化出版事业，迫得我们不得不再度向读者，及同情我们的人士，伸出救助的手。请你们在精神上及在经济上给我们支持，参加我们的社，并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参加。（司马文森、陈残云，1947）

《新风》编辑西玲使出推波助澜之力，祝福他们取得好成绩，“非仅该社幸甚而已，亦吾马来亚文艺界之荣也”（西玲，1947a）。《民声报》文人集团坐言起行，马上组织起来，商讨如何帮助文艺生活社（叶蒂，1947；西玲，1947b；周容，1947c）。他们采取的实际行动，包括充当中介帮忙征收海外会员与捐款，更发动《民声报》作者把稿费捐献给《文艺生活》。而在进行援助香港《文艺生活》之际，

创办马华文协组织的倡议、马来亚宪政运动等都同时在进行着。可见,“此时此地的现实”的提倡,并没有让人们完全回避中国问题¹⁶。

面对海外读者热烈的反响¹⁷,司马文森意识到了自己的“双重任务”:

我们觉得自己所负责任是更加重大的,我们不单要为祖国的民主继续斗争下去,也意识到大家有一个新的任务,交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无法推托,那就是,我们得通过这个小刊物来团结海外的文艺新军,把他们团结在民主文艺的旗子底下,向反动派进军!(司马文森,1947a)。

也是因为这个机缘,司马文森牵涉进了“此时此地的现实”的讨论,同时也陷入当时马华文坛的困境:作为革命武器的文学,要如何处理双重(或多重)任务?以援助《文艺生活》为例,马华文学在介入香港文学的斗争时,会否忽略在地的革命任务?

周容在声援运动一开始就发表〈我献稿〉一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把援助《文艺生活》和马来亚革命任务对立起来:“马来亚的热爱的民主的文艺青年,此刻都各各有他们更近更急的工作,事情恐怕一时难以完全做到。然而另一方面呢,《文艺生活》却急着需要救助”。面对这个两难,周容划清两个任务界限的办法,就是马华作家的“献稿”运动(捐献稿费)(周容,1947c)。言下之意,马华作家仍关心与书写“此时此地的现实”,对《文艺生活》仅提供财务解困的帮助。周容这样的一种处理办法,相信对司马文森有所启发,并影响其接下来如何讨论“此时此地的现实”。

¹⁶ 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例如,主张马华文艺运动不是中国文艺运动支流的左丁就提到,“是不是马华文艺运动就这样断绝了与中国文艺运动的联系呢?相信即使是犯着严重的色盲症的人,也未必老关在楼阁里就嚷嚷:‘是的,是的!’吧”、“马来亚不是‘租借’,更不会‘香港’,‘侨民文艺’之行不通不用说;所谓面对现实,也决不能只是作品上的单纯反映‘地方色彩’。”(左丁,1947)这种“独立于中国,却不跟中国断绝联系”的想法,在当时马华派中是相当主流的,其他持此论者如丘天(1947)、普洛(1947a; 1947b)、艾伦(1947a; 1947b)等。

¹⁷ 司马文森征求海外社员,在经过几个月努力,于1947年7月已经成功招收五百个社员(司马文森、陈残云、张殊明等,1947)。他们的“海外”,除了南洋,还有美洲和加拿大(司马文森,1947a),在南洋则包括几个重要地点,如新加坡(新南洋出版社金丁)、吉隆坡(民声报西玲)、菲律宾(岷里拉华侨导报林林)、暹罗(暹京民主新闻社杨繁)(文生社,1947)。据流文(1947)转《文艺生活》第十四期的报告,最热烈协助文生社的地区首推吉隆坡,但编辑纠正该报和吉隆坡文友的捐献稿酬来自全马,甚至包括曼谷(编者,1947b)。无论如何,这说明《民声报》在当时是全马重要报刊,动员能力强大。

五、宋芝论“此时此地的现实”

宋芝自称在逃难到香港之时，开始想思考南洋文艺的问题，但却苦于缺乏材料，对当地不太了解而无从下手。自从向海外读者求援得到热烈响应后，宋芝跟各地文友频密联络。《民声报·新风》编辑西玲更转发了一些稿件（包括周容的〈我献稿〉）给他，引发他对“建立马华文艺界民主的文艺战线”的讨论。至此，他已不再是马华左翼文坛的局外人，他开始介入当地文坛“组织化”（创办马华文协）、“独特性”、“此时此地的现实”等的争论中。

司马文森在1947年4月发表〈建立马华文艺战线〉，初步处理此问题。然而，这篇文章的论述立场反复无常，让人摸不着头脑。一开始他提到“南洋的文艺运动，远落在南洋民主运动之后”，似乎是在指责当地先进文艺作家没有领导与建立南洋的文艺战线。接下来，他却突然提到南洋华侨对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贡献，故主张大家“应该拿出他们支持过去中国无数次革命事业的精神，来支持祖国的民主战线，南洋的文艺界朋友，应该在这个时候集合起来，通过香港这个口站和国内和解放区中民主的文艺战线携手来，不单为了团结力量，也为了交换彼此的战斗经验”（司马文森，1947b）。如此来看，其所谓的“马华文艺阵线”很可能不过是附属于“中国文艺阵线”的支流。

然而，奇怪的正是，接下来司马文森提起西玲告诉他的一番话，即“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表现南洋生活，充满了南洋彩色的作品”，于是他又转而大力呼吁，南洋作家应以南洋为写作对象：

坚持在南洋赤道线上，民主的文艺斗士，把眼睛，把笔触，注意在这些兄弟民族的斗争上去，表现他们的翻身，表现他们的觉醒，歌颂他们新兴的年青的共和国，这才是你们今日主要的中心课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得出一部充满南洋彩色的作品。（司马文森，1947c）

来到文末，司马文森又一次大反转，不无矛盾地高呼：“时候是紧迫了，让我们，香港的文艺界朋友和南洋的文艺界朋友，紧密的携起手来，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和平斗争到底。”（司马文森，1947c）

到底司马文森是在呼吁大家要关心中国民主运动，还是马来亚（或南洋）的民主运动？反复的立场何以能够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章之中？

除了这种以祖国情感号召建立马华文艺战线，司马文森也透过普遍的民主争取各地华人的支持。在上述文章发表的差不多时间，他在香港主持的《文艺生活》发表了一篇署名编者的文章，题目是〈在民主文艺的旗子底下集合起来！〉，内容提到文艺生活社在推动徵求社员运动，并提到：

我们以无限的热诚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新社员, 新的合作者。让我们共同努力, 共同奋斗, 把我们自己“训练成为一支争取民主的队伍”(来信), 成为一支争取民主的文化队伍吧!

在民主文艺的旗子底下集合起来!(编者, 1947, 页 2)

所谓的新社员, 有一大部分来自海外¹⁸, 特别是南洋一带。无论如何, 从上述来看, 司马文森跟当时许多论述者都陷入相似的困境, 即要如何很好地处理中国与马来亚的革命斗争任务之普遍性与独特性难题。其中的关键, 不仅因为双方的革命运动在当时都非常紧迫, 以及他们难舍难离的中华民族情怀, 更是跟他们所信奉的左翼国际主义思路有关。

1947 年 5 月 30 日,《民声报》转载宋芝在《文艺生活》发表的〈建立马来亚“文艺阵线”问题〉¹⁹一文, 这篇文章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 宋芝面对的理论困难是怎么回事。宋芝认为, 战后的世界进入一个“新民主主义力量”的时代, 人民大众普遍觉醒。南洋各国民族历来跟中国人关系密切, 很多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有中国人的参与, 而中国人也成为当地人学习的对象, 彼此甚至共同携手对抗殖民地统治者。文章还提到两个重要看法, 一个是“作为大哥的中国民主力量”(也就是中共), 除了领导中国的民主解放运动, 也没忘记有着不可分的血缘关系的东方殖民地解放运动。另一个则是, “民主的进步力量是不可分割的”。这两个看法结合起来, 也许解释了司马文森看似反复的论述, 在他自己看来根本就安好无事。原因在于, 中国民主文艺阵线有着本土与国际的双重性, 书写南洋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 其实也落在中国民主力量的国际主义关怀之内, 而且它还是这些运动的老大哥。故此, 当宋芝主张南洋作家必须书写南洋题材时, 实际上也可以被包括在中国文艺的国际主义关怀之内, 毕竟“民主的进步力量是不可分割的”。宋芝, 如同后来的其他独特性论战的参与者, 以这样的辩证逻辑, 处理了普遍性与独特性的矛盾。另外, 虽说宋芝赞同“马来亚的文艺阵线, 应该是独立阵线, 不必附属在中华文协底下”, 并认为马华有自己的任务和特点, 故不应一味抄袭中国。但是, 既然“民主的进步力量是不可分割的”, 则双方仍存在联系, 且这种联系应是由力量强大的中国来领导(宋芝, 1947a; 宋芝, 1947, 页 5)。

宋芝处理了书写题材、任务与对象, 却未处理是否应该有一个马华民族的问题。这问题在当时尚未爆发, 未处理也是情理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其他文章仍视马华文艺为“侨民文艺”, 并主张马来亚侨民文艺跟马来亚人民解放运动

¹⁸ “扩大徵求社员, 两个月结算下来, 成绩超过了预算。特别是海外的青年文艺工作者, 参加的异常踊跃。”(司马文森, 1947)

¹⁹ 此文也刊登于香港的《文艺生活》, 见宋芝(1947)。补充一点, 宋芝在此文也用了“此时此地”四字: “自然, 马来亚民主文艺阵线的建立也有他们自己的任务和特点, 决不能一味抄袭中国的一套, 要根据此时此地不同形势来决定他的路线。”(宋芝, 1947a; 宋芝, 1947, 页 5)

相配合（宋芝，1947f），而此“侨民文艺”在独特性论战前期已经被一些马华派所唾弃，如左丁就指出侨民文艺行不通；在独特性论战中侨民文艺更是遭到大规模清算（左丁，1947）。无论如何，我们清楚可见，在宋芝身上（包括其他独特性论争参与者），一些关于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多重思考痕迹。这一点，在宋芝为《民声报》撰写的系列专稿中，表达得更明确：

自然，世界的和平民主是不可分割的，祖国的和平民主与否，可能严重地影响到了海外侨胞。同时，海外侨胞的一举一动，也能影响到祖国。但我以为文艺这种武器，是有其独特性，它是国际性，全国性，同时它是地方性的。在总的趋向底下，在总的目标底下，我们有要求每个文艺工作者，站在自己的岗位，拟具一个适合于此时此地的写作和活动纲领，以今天的情形而论，留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和留在香港的文艺工作者，不论其为和平民主斗争的目标是一致的，而在他们实际执行其战斗任务时，却是有差别的。（宋芝，1947b）

把上述粗体字用我自己的方式高度概念化来表述：作为革命武器的文艺，有着空间和时间的特点，并且由后者规定前者。所谓的空间，就是从地方到全国再到世界。所谓时间，则可区分当前历史与历史终点。按照左派的历史决定论观点，所谓“在总的趋向底下，在总的目标底下”，其实就是指历史终结之后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任何当下（此时）的写作和活动纲领，虽享有一定自主性，却绝不可偏离此“总的趋向”为目标，否则就是不正当。同理，任何当地（此地）与其他地方（彼地）的写作和活动纲领，虽可享有一定的多元性，却也逃不过必须走向“总的趋向”的未来。换言之，“此时此地”被“彼时彼地”所牵绊，并且由“彼时”（历史总趋势）限定此时此地与彼地的可能性。周容在独特性论战期间没有很好表达出来（但他本身并非不知道）的观点，其实已经相当完整地由宋芝阐述出来了。

六、结语

本文探讨了独特性论战前期在星马港关于“此时此地的现实”的讨论情况，特别聚焦于《民声报》与香港文人宋芝身上。从以上讨论所见，宋芝虽然身在香港，对南洋的了解也不甚充分，却在《民声报》编辑西玲的鼓励之下，加上他自己敏锐的政治触觉，个人的南洋经历，以及香港作为南洋的对口地理位置等，在在促使他参与了“此时此地的现实”概念的讨论。

宋芝的贡献有两点，其一他在“此时此地的现实”概念的理论工作有建树。其次，他不仅以个人身份参与，也穿针引线，促使其他人涉入“此时此地的现实”的讨论，在香港推广“此时此地的现实”（或其相关议题，如南洋或马来亚文艺阵线之建立），让其成为各地文坛实践理论的参照。

参考资料

- 阿宁 (1947, 7 月 31 日)。介绍《文艺学习散记》。《民声报》, 8 版。
- 艾伦 (1947a, 4 月 17 日)。关于马华文艺组织的二三事 (上)。《民声报》, 8 版。
- 艾伦 (1947b, 4 月 18 日)。关于马华文艺组织的二三事 (下)。《民声报》, 8 版。
- 编者 (1946, 11 月 23 日)。读作界的意见。《民声报》, 8 版。
- 编者 (1947)。在民主文艺的旗子底下集合起来!——为“文艺生活社”徵求社员运动告读者。《文艺生活》, (31), 2。
- 编者 (1947a, 2 月 15 日)。预告。《民声报》, 8 版。
- 编者 (1947b, 6 月 12 日)。编余杂写。《民声报》, 8 版。
- 编者 (1947c, 7 月 22 日)。《新风》稿约。《民声报》, 8 版。
- 崔贵强 (2007)。《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 (修订卷)》。青年书局。
- 光明 (1948, 2 月 6 日)。我对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的意见。《民声报》, 7 版。
- 郭沫若 (1948, 3 月 16 日)。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民声报》, 5 版。
- 海郎 (1948, 2 月 4 日)。是“侨民文艺”呢, 还是“马华文艺”? (三)。《民声报》, 7 版。
- 海生 (1946, 11 月 26 日)。关于《新风》的讨论——马六甲写作人集体座谈后的意见。《民声报》, 8 版。
- 胡愈之 (1947, 1 月 1 日)。和平民主运动在南洋。《民声报》, 1 版。
- 贾芝裳 (1947, 8 月 7 日)。不能征服的人。《民声报》, 8 版。
- 老蕾 (1945, 9 月 11 日)。论现阶段的文艺运动。《民声报》, 4 版。
- 罗骚 (1946a, 11 月 29 日)。论华侨与马来亚政制的关系 (上)。《民声报》, 7 版。
- 罗骚 (1946b, 12 月 5 日)。论华侨与马来亚政制的关系 (下)。《民声报》, 7 版。
- 流文 (1947, 6 月 12 日)。“希望”二题。《民声报》, 8 版。
- 木公 (1946, 12 月 4 日)。当前文艺运动任务。《民声报》, 8 版。
- 普洛 (1947a, 4 月 1 日)。从马华社会的现实出发 (上)。《民声报》, 8 版。
- 普洛 (1947b, 4 月 2 日)。从马华社会的现实出发 (下)。《民声报》, 8 版。
- 秋枫 (1948, 3 月 27 日)。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一个报告。《南侨日报》, 8 版。
- 丘天 (1947, 3 月 18 日)。关于组织马华文艺协会。《民声报》, 8 版。
- 仇特 (1947, 5 月 31 日)。响应“六二”运动。《民声报》, 8 版。
- 少康 (1947, 1 月 13 日)。华侨能不关心马来亚政制吗。《民声报》, 7 版。
- 社论 (1945, 12 月 6 日)。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民声报》, 1 版。
- 社论 (1946, 4 月 6 日)。华侨应参与当地政治。《民声报》, 1 版。
- 社论 (1947a, 10 月 15 日)。展开广泛研究新宪草运动。《民声报》, 2 版。
- 社论 (1947b, 5 月 28 日)。马来亚青年学生应响应“六二”运动。《民声报》, 2 版。
- 社论 (1947c, 9 月 5 日)。是时候了。《民声报》, 2 版。
- 社论 (1947d, 9 月 6 日)。共同目标与一致行动。《民声报》, 2 版。
- 社论 (1947e, 9 月 16 日)。共同利益与个别要求。《民声报》, 2 版。
- 社论 (1947f, 9 月 18 日)。为什么要联合行动。《民声报》, 2 版。
- 社论 (1947g, 9 月 19 日)。可以联合吗?。《民声报》, 2 版。
- 社论 (1947h, 9 月 29 日)。评马来亚新宪法草案。《民声报》, 2 版。
- 司马文森 (1947)。打算怎么做?。《文艺生活》, (32), 29。
- 司马文森 (1947a, 3 月 27 日)。寄向海外——向援助《文艺生活》的朋友们申谢 (下)。《民声报》, 8 版。
- 司马文森 (1947b, 4 月 3 日)。建立马华文艺战线 (上)。《民声报》, 8 版。
- 司马文森 (1947c, 4 月 4 日)。建立马华文艺战线 (中)。《民声报》, 8 版。
- 司马文森 (1947d, 4 月 5 日)。建立马华文艺战线 (下)。《民声报》, 8 版。
- 司马文森、陈残云 (1947, 2 月 24 日)。同情我们的朋友, 请伸出支助的手来! 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民声报》, 8 版。
- 司马文森、陈残云、张殊明等 (1947, 7 月 25 日)。文艺生活社。《民声报》, 8 版。
- 宋芝 (1947)。建立马来亚“文艺阵线”问题。《文艺生活》, (32), 5。
- 宋芝 (1947a, 5 月 30 日)。建立马来亚“文艺阵线”问题。《民声报》, 8 版。
- 宋芝 (1947b, 8 月 23 日)。表现“此时此地”问题 (上): 文艺学习散记之五。《民声报》, 8 版。

- 宋芝（1947c，8月25日）。表现“此时此地”问题（中）：文艺学习散记之五。《民声报》，8版。
- 宋芝（1947d，8月29日）。表现“此时此地”问题（下）：文艺学习散记之五。《民声报》，8版。
- 宋芝（1947e，9月30日）。再谈“表现此时此地”问题（上）。《民声报》，8版。
- 宋芝（1947f，10月1日）。再谈“表现此时此地”问题（下）。《民声报》，8版。
- 苏颖欣（2021）。论战、现实与马华革命文学：金枝芒的“此时此地”实践。《文化研究》，（32），9-46。
- 唐林（2000）。马华文学的左翼思潮。《人文杂志》，（3），8-14。
- 文生社（1947，4月9日）。文生社继续征求社员。《民声报》，8版。
- 文萱（1948，3月12日）。马华文艺论争的诸问题——壹个座谈会的结论。《民声报》，5版。
- 吴小保（2020）。文革思潮下的《浪花》：论马华左翼文学主体的开展与变化。《台湾东南亚学刊》，15（2），57-94。
- 吴小保（2023）。马华文艺独特性遗产的局限与可能性：以翻译乌斯曼阿旺为个案。《中国现代文学》，43，135-169。
- 西玲（1947a，2月24日）。为《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而写。《民声报》，8版。
- 西玲（1947b，2月26日）。怎样参加《文艺生活》社。《民声报》，8版。
- 许德发（2022）。《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时报文化出版。
- 谢诗坚（2009）。《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马来西亚檳城韩江学院。
- 叶蒂（1947，2月25日）。援助“文艺生活社”。《民声报》，8版。
- 玉女（1947，9月16日）。《文艺生活》新第十六期。《民声报》，8版。
- 原不二夫（2006）。《马来亚华侨与中国——马来亚华侨归属意识转换过程的研究》。大通出版社。
- 周刚鸣（1947，5月14日）。周刚鸣先生来信录。《民声报》，8版。
- 周容（1947a，12月26日）。谈马华文艺。《战友报》，4版。
- 周容（1947b，2月3日）。老子的地方。《民声报》，8版。
- 周容（1947c，3月4日）。我献稿。《民声报》，8版。
- 周容（1947d，3月21日）。闭关时代。《民声报》，8版。
- 周云（1947，9月25日）。写什么。《民声报》，8版。
- 左丁（1947，3月24日）。文艺访谈（下）。《民声报》，8版。
- Chong, F. H. (2016). *Sastera Mahua dalam kritikan dan pensejarahan*.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 Hussain, M. (1999). *Memoir Mustapha Hussain: Kebangkitan nasionalisme Melayu sebelum UMNO*.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PUTERA-AMCJA. (2017).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